

抗争是安妮·埃尔诺写作的一条主线

黎在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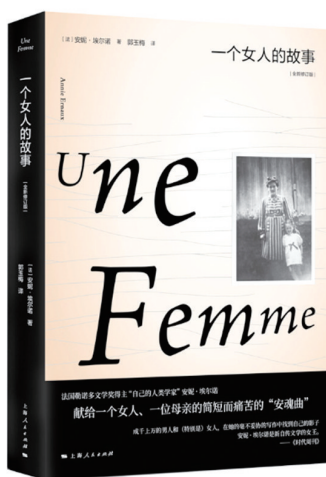
借用捷克诗人霍朗“我的生活是奇妙的,因为它如此平凡”这一逻辑,我们可以说,安妮·埃尔诺的写作之所以享有盛誉,是因为她所写内容是如此之平凡。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埃尔诺作品中那些关于个人体验、人生经历的叙写,呈现了她丰饶的内心世界,折射出当时不同时期法国社会乃至世界的风云变幻。弱水尽管有三千,我在这里只取一瓢饮。

诺奖授奖词中说埃尔诺“勇敢而敏锐地揭露了个体记忆的起源、隔阂与集体压抑”,这种“揭露”实际上是一种有意无意地抵抗。可以说,抗争构成她人生和写作的一条主线,抗争也成为她作品中人物人生的主旋律。

我们多少有些偶然来到这个不容我们选择的世界,我们如何面对这一现实?安妮·埃尔诺及其父母选择了抗争。她的父母努力改变“肮脏、污秽、丑陋、恶心”的生存、生活环境,尽力为埃尔诺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以便让她将来生活得比自己好;埃尔诺努力学习和工作;因“拯救什么东西的紧迫感”而从不同角度剖析、审视那些在性别、语言和阶级等方面有着强烈差异的“细枝末节”,并予以个性化地呈现;埃尔诺不只是对2019年法国反政府抗议群体“黄背心”表示同情,还在采访中宣称自己是“黄马甲事件”中的一员;还有,2020年在致总统马克龙的公开信中她措辞严厉地警告对方:“我们很多人不想再要一个明显不平等的世界,瘟疫已经暴露出它的真实面目;相反,我们很多人想要的,是人的基本需求——健康的食物、医疗、住房、教育、文化——能够得到保障的世界,今天的团结局面确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世界有实现的可能。”林林总总,都是不屈地抗争。

诺奖评委主席安德斯·奥尔森认为,埃尔诺的写作展现了一种罗兰·巴特所谓的“零度写作”的倾向——不掺杂个人情感的客观写作状态,但同时又笼罩着一种“对她所脱离的社会阶层的叛逆情绪”。这种叛逆就是一种抗争。她的抗争既有主动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

1962年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要为自己的出身雪耻!”表明那时她就产生了洗雪命运强加给她的耻辱社会身份的意念,虽然雪耻的方式方法和途径不明确。1968年,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继承者》犹若“一道秘密指令”,引领她“沉入”深层记忆,“书写在自己阶级身份提升的过程中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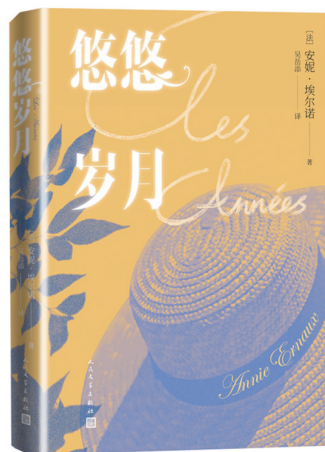


《一个女人的故事》
安妮·埃尔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受到的痛苦,以及羞耻,等等”。于是,写作就被看做成一种能让人看到社会不平等的政治行为,她肆意而不乏节制地挥舞起写作这把“刀”,残酷撕开想象血淋淋的面纱,从纵深维度直面广阔的社会现实。

在她生命的某一时刻,一直“认为是耻辱所以深藏起来”的一切突然之间“值得被重新回忆”,被重新赋予了意义,于是,她驱动文字,包括大量冷静地几同冒犯的叙事描述、展现个人记忆与人们集体经历之间的微妙互动,让人们从“简单的激情”中见到自己,重返日渐逝去的社会和时代,以召唤内心深处的渴望,展开与时代的对话,探讨时代难题如女性不平等。她坦言:“我写《正发生》是为了保存对数百万女孩和妇女遭受的暴行的记忆。”这种以描述、呈现包含屈辱在内的经历为方式的抗争对埃尔诺本人来说,首先是一种自我救赎。有一次,她告诉采访者,不把那些经历写出来,它们就会不断纠缠自己,让她不得安宁。埃尔诺在今年出版的《年轻男人》(Le jeune homme)的题记里写道:“如果我不把它们写下来,事情就还没完成,它们只是经历过了。”而在《那些年》中,她认为正是那些“洗去耻辱印记的记忆”,为她勾勒了一个文学、知识以及政治的前途,让她能够重新解读、阐释自己不同阶段人生轨迹以及她个性的不同构成维度,也不断治愈她内心的伤痛。

埃尔诺一直在抗争,或言一直在叛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之为“阶层叛逃者”(transfuge de classe)。这一名词来自于哲学家尚塔尔·雅奎特,指从一个阶层阶级向上流动至另一个阶层阶级的个体。“transfuge”在法语中有“逃兵”义,而逃兵,既为己方所不齿,也未必会被对方接纳,因此,“阶层叛逃”不只是指身份改变之过程和结果,还含有个体“卡在两个世界之中”的尴尬心理和精神状态,譬如她曾背负父亲的不理解,长期在“努力离开母亲”和“深爱母亲”矛盾中挣扎。阶层叛逃在埃尔诺身上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通过不断地写作,以实现她精神上的“叛逃”和心灵的皈依。



《悠悠岁月》
安妮·埃尔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然,这种阶层叛逃不只是她,还包括她的父母以及不同阶层等,在为她赢得1984年勒诺多奖的《位置》里,她说:“最让父亲自豪的,甚至也是他生存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让我进入一个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在被问到将诺奖颁给埃尔诺向世界传递什么信息时,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安妮·埃尔诺在文学上的质量和共性,适合每位读者。”埃尔诺的一系列叛逃行为和作品所蕴含的抗争精神应该从属于这里的“共性”。当然,她作品中能够让受众引起共鸣的“共性”远不止这些,譬如下面这段平实朴素的叙事就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里的人们,总是在亲朋的婚礼或是领圣餐前的几个月前就开始计划起来,他们提前三天就留出自己的肚皮以便让自己能够在婚宴上或领圣餐仪式上吃更多的食品。”

还是在《位置》里,她写道:“村里有一个患猩红热的小孩病情刚有所好转,由于大人拼命地给小孩往嘴里喂鸡肉,孩子在呕吐时憋死了。”这样看似不可思议的描述犹如被镜头捕捉到的日常画面,能唤醒那些有过类似童年经历的人们的记忆。

她和她的叙事就是如此之直白,直白得近乎残酷,但又给人灵魂以震撼。她说:“我明白写小说是不可能的事,我只是要叙述一个为生存而奋斗一生的人,我没有权利将我写的作品称为艺术,更不能追求作品如何如何激动人心。我只是要把他说过他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以及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事客观地记录下来。”“我只是以平淡自然而单调的笔调,即我曾经给父母写信报平安时用过的笔调来描写的。”这种避开先前“主观视角”的抒情书写,而代之以平实叙事能够“将叙述的中心简化为一种20世纪晚期灵魂的肖像”(琳达·巴雷特·奥斯本语),是为突破“社会阶层之间的隔膜”而做的努力,本质上仍然是抗争。

10月6日下午,埃尔诺在记者面前表示:“这次的诺贝尔奖是一种责任,我要继续与不公正作斗争。”而且表示,她会初心不改,会抗衡到最后一口气。她的抗争,她的人生体验、

生命记忆远不止承载个人丰赡的情感、情绪、困惑、感悟、情境乃至幻想。埃尔诺卓有成效的抗争,不只是因为她出众的才华,更源于她的深情,对父母对人生对女性对世界的深厚感情。

埃尔诺依据自己的情感、立场、趣味与理论预设,对个人记忆和社会现实进行有效的选择与建构,以广阔的视野和跨媒体、跨文体的形式,把广阔而丰富的社会历史和有声有色的立体法国镶嵌在个人化的体验和记忆之中,使之在美学方面得以纵深拓展,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审美内涵。在《位置》中,她写道:“……父亲总是从挂在厨房里的地图上时刻注意着部队进攻的情况,注意着战局的变化。”还说“战争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譬如人们在咖啡厅不再喝苹果酒而改喝葡萄酒,女孩子也不再喜欢在农场干活的小伙子。

诺贝尔奖评审安德斯·奥尔森在言及《悠悠岁月》时说:“串联起文字的不仅仅是战争结束、电脑诞生、智慧手机普及等历史大事件,还有那些在当时被社会忽略或不被言说的小事——经历、文字、广告、涂鸦、衣物、电影、习俗、信仰。”正是因为她那些富有个性特色的生命体验、个人记忆、人生经历融入阶级与国族叙事而承载许多人的记忆,所以不止一代人能从她的叙事、呈现中身临其境。也正因为她不断建构起让读者置身其中、重构自我的世界,所以,埃尔诺的作品不只是文学之作,也是历史之作、现实之作、思想之作,而且还是生命之作。

“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环中”可类比为作品生命,于埃尔诺作品,突出表现为抗争。今年诺奖以“暴露”的名义肯定埃尔诺顽强不屈地执着抗争,彰显的是无比尊贵的生命价值。内容的抗争性和高超的叙事技巧犹若写作之两轮,相依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成就了她作品的经典化。

雅斯贝尔斯认为:“理解取决于理解者的本性。”每一位读者都是带着自身的人生阅历和特有生命体验等“前见”走进具体文本的。阅读优秀文本的过程,是与作者、作品中的人物不断展开对话的过程,是一个真切的生命去感受另一个鲜活生命的过程,一个灵魂呼唤另一个灵魂的过程,因而是使文本复活的过程。埃尔诺之所以享有盛誉,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抗争精神能够激活读者的生命活力,让他们从那些日渐淡忘的记忆中召回那些失散的灵魂。

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80有余的安妮·埃尔诺激动不已地说:“我很高兴,我很自豪。”对一个以创作为志业的作家来说,能够有诺贝尔文学奖来肯定自己的创作,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我相信,对安妮·埃尔诺这样级别的作家,读者的阅读,读者在不断延伸的时空维度中的接力阅读是更让她称心快意的事。既然阅读是向这位老人致敬的方式,那就去读她的那些可能让自己惊艳的作品吧!

